

# 凉州会盟推动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罗旦

(中央民族大学 藏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通过对凉州会盟本身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并放眼于其后的元代历史,探讨萨班和阔端会盟我们耳熟能详的意义之外,通过对此次会盟中一些细节及其影响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力图呈现出一种角度不同但具有历史厚度、不失真实的一些实质性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 凉州会盟 一老两小 帝师 色目人

从成吉思汗到元世祖忽必烈先后消灭西辽(1131—1218年)、西夏(1038—1227年)、金(1115—1234年)和大理(937—1253年)。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建都大都(今北京市)。元朝的统一,继承和发展了秦、汉、隋、唐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结束了自辽国建立(916—1125年)以来三百六十多年间的分裂战乱局面。这是元朝对祖国的伟大贡献。在统一中国本土的过程中,如上所述,都是以战争解决问题的,唯独对西藏归顺成为蒙古汗国、元朝领土的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的。难道是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对藏人情有独衷、网开一面,还是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通过对凉州会盟的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凉州会盟既是大势所趋、顺应历史潮流之举,有其必然性,但同时不可否认也存在重要的客观因素和偶然性。

## 一、蒙古族同藏族接触的历史探源

藏族与北方蒙古高原的联系,其线索可以追溯到吐蕃王朝时期。《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之父朗日论赞攻灭藏区部落首领赤邦松时,赤邦松之子莽布支逃往突厥。吐蕃王朝建立后,当时北方的突厥、回纥都与吐蕃有通使关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有突厥可汗到吐蕃致礼的记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古突厥文《厥特勒碑》中,有吐蕃使者参加突厥可汗葬礼的记载。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安西四镇后,曾与突厥、回纥发生战争。到蒙古汗国时期,蒙古又在征服西夏的战争中与藏族地区发生了直接接触。根据元史记载公元1205—1209年成吉思汗三次领兵进攻西夏,西夏国王李安全献女讲和。1218年,蒙古再次进攻西夏,西夏国王李遵瑱逃到西凉府。到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接纳自己的仇人王罕之子,又不遣使入贡,再次率军进攻。1227年成吉思汗领兵渡过黄河,进攻积石州,破临洮、洮河、西宁等地,进入藏族地区。

根据藏文史籍《如意宝书史》、《蒙古教法史》、《新红史》认为1206年成吉思汗就已经同藏区发生了联系。当时成吉思汗组织了一次向藏区的军事进攻。由于西藏没有较为统一的地方政权,各地大小封建领主割据一方,各自为政。除非遇到重大事情时才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当得知蒙古军队即将进攻藏区的消息后,西藏各地的封建领主集会商议,决定派出雅隆觉卧家族的第悉觉噶和蔡巴噶举派的贡嘎多吉为代表去见成吉思汗,申明西藏归顺蒙古,并从卫藏地区携带佛像和佛经前往蒙古地区,这也拉开了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序幕。

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和意大利学者都倾向于这种观点,并且杜齐《西藏画卷》中(Tibetan Painted scrolls)1949年英文版,第一卷第5页。)进一步指出成吉思汗是在1207年进攻西藏的。但是就西藏地方所派出的谈判代表两位学者的观点不尽一致。东嘎先生认为,蔡巴·贡嘎多吉的生卒为1309—1353年,与成吉思汗并非同一时代人物。《西藏政教合

一制度》,而杜齐认为贡嘎多吉“在西藏必定曾经是一位最高统治者,因为成吉思汗准备入侵西藏时,就在他及另外头人手中接收西藏的归顺。”

蒙文史籍《蒙古源流》中说,成吉思汗1206年用兵土伯特只古鲁格多济汗。《多桑蒙古史》、《新元史》卷十七中记载,1223年成吉思汗到达北印度,准备取道西藏返回,收服阿里部土伯特人众,致书于大喇嘛。

从以上这些可以看出,究竟成吉思汗是否与西藏联系过,以上罗列的材料常常相互矛盾。“虽然有的目前尚无定论,需进一步研究,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可汗在西藏已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或者双方可能有过某些联系和接触。”对此王辅仁、陈庆英先生指出:“这里罗列的材料,只是说明有些史书的记载如此,可作参考,也可作为传说看待。在历史上抛开传说,第一个和西藏发生关系的蒙古王室成员为阔端,而不是传说中的成吉思汗。”笔者进一步认为,不管阔端之前是否有蒙古族王室或者蒙古族同藏族社会进行接触,可以肯定的是凉州会盟是蒙藏历史上有确切记录的,毫无争议的两个民族统治阶层的第一次公开接触的开端。

## 二、凉州会盟的必然性及其客观因素

### (一)凉州会盟的必然性

1.以卫藏为中心的藏区所具有的军事价值。以卫藏为中心的藏区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地域,其地势高峻,路途险远。在军事上具有居高临下和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公元13世纪,蒙古族代突厥而起,成为称雄我国北方草原最强大的民族。凭借其强大的武力优势,经过几十年的征战,终以马上得天下,先后亡西夏,臣金宋,统一中国,第一次以少数民族入据中原,建立元朝,并将地绝险远的藏族地区第一次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之内,使其疆域空前扩大。在如此辽阔的疆土上,如何有效地实施其统治,对于地处险远、民风强悍的西藏的治理便至关重要。

其次,蒙古在灭掉盘踞于西北的强大的西夏政权以后,已为它从西南方向进攻南宋打开了一个缺口。当时,蒙古在西北屯有重兵,其主要目的是想要从青藏高原藏区的东缘南下,进攻四川、云南等重镇,以从西南方向对南宋政权形成包抄之势,而这条路线主要经过藏族地区。所以,蒙古军队要开通这一路线,首先必须取得对以卫藏为中心的青藏高原藏区的控制。

2.以卫藏为中心的藏区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此外,以卫藏为中心的青藏高原藏区在交通位置上极为重要,它位于中亚、南亚和东亚三大地形板块的交汇处,是连接三者的重要交通枢纽。在青藏高原藏区的北面,是中国通往中亚和西亚的主要交通要道,即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当蒙古汗国成功地完成了对中亚、小亚细亚、新疆以及西夏等辽阔地域的征服之后,这条线路实际上已成为蒙古维系其西征后所建辽阔帝国的命脉线,保证这一线路的畅通乃成为蒙古的当务

之急。如果让藏区这样一个处于重要经济枢纽的辽阔区域置于蒙古汗国统治圈之外,对于蒙古的西部阵地显然是极不安全的。

## (二)凉州会盟的客观因素

1.西藏地方没有组织大规模反抗运动的能力。如前所述,蒙古军侵入藏地后攻占焚烧寺庙,屠杀僧众,仅有零星抵抗并很快熄灭。多达那波军队驻留当地一年多未再发生武装冲突,这与蒙金、蒙宋战争中原人民历时多年,顽强抵抗截然不同。西藏方面没有进行有力的抵抗,其一,是因为西藏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象金和南宋一样,可以动员广大人民,调动足够资源全力抵抗。西藏自九世纪吐蕃王朝瓦解后就长期处于大分裂中,以后再未实现统一。到13世纪中叶蒙古人兵临时,他们难以步调一致地组织大规模的抗蒙战争;其二,是因为西藏各界久闻蒙古兵所向披靡,如洪水猛兽,不可阻挡。藏地已经被他们的军威所震慑,丧失抗敌信心和勇气。蒙古军几次西征和灭西夏,灭金攻宋,战功赫赫,藏族百姓早有所闻。再加上长期内乱,元气大伤,西藏方面已无力进行坚强的抵抗;其三,蒙古人的进攻也只是试探性的进攻,意在看是否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否则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其胜算还是很大的。

2.西藏特殊的地理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非蒙古人以武力可简单征服之。西藏地处雪域高原,道路崎岖,空气稀薄,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即便今日,内地人进藏生活都很难适应。当年成吉思汗西征胜利班师时,原想从印度河岸假道吐蕃回来,就因地形险阻,难以通行而改循原路返回。多达那波军队只推进到藏北和拉萨一带,未继续深入卫藏,恶劣的环境定然给其行军带来困难。且不说这支军队孤军深入,就是蒙古大规模进军,西藏的地理环境也将给其军事征服设置极大的障碍,使其损失惨重,得不偿失。

另外,整个西藏地区人口较少,生产力水平不高。这种情况决定了蒙古方面就是大量派兵,在西藏广阔而相对贫瘠的土地上,也将无法保障军粮的供给。因为西藏不象新疆一样耕地广阔,气候适宜,士兵可以长期驻屯。如果单靠内地运输军粮来支持大部队,仅运输也将耗费惨重,和打一场持久大战一样。就算蒙古军队能克服艰难险阻,一部分一部分地征服西藏各割据势力,没有经济基础,也将无法长期驻守和最终控制西藏。

3.西藏宗教各势力寻求靠山的共同心理特征为凉州会盟的圆满进行奠定了现实基础。9世纪以来,吐蕃社会在长期的分裂中向前发展。各教派在长期的发展中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势均力敌,各个势力都想借助外力打击对手。据东嘎·洛桑赤列著的《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一书称,早在1239年,西藏各教派已纷纷派代表到蒙古地区去,给自己找靠山。尽管这一材料真实性仍值得考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凉州会盟后西藏各地方势力纷纷迫不及待地寻找靠山的事实,如帕木竹巴、雅桑巴归顺了旭烈兀王子;止贡巴归顺了忽必烈王子;达隆巴归顺了阿里不哥王子等,进一步说明当时各个势力寻求靠山保护其利益的心理。

## 三、凉州会盟的实质意义

历史上的凉州会盟决不是一次简单的和平谈判,当时蒙古大军扫平了蒙古各部,消灭了西夏王国,占据了北中国广大的疆域,凉州王阔端虎视眈眈陈兵卫藏边境,战争一触即发,然而具有完全不同历史习俗和宗教传统的两个民族却出乎意料地和平统一了,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杀戮和征伐。这一切毫无疑问地归结为“凉州会盟”的历史功绩。具体表现在:

1.凉州会谈的圆满结局,结束了吐蕃王朝之后长达四百

年的分裂动荡局面,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逐步定型。随着九世纪吐蕃王朝统一政权的崩溃,在西藏出现了许多王族后裔和地方势力的割据政权,同时,随着反佛势力的消沉,藏传佛教经上下两路的弘传得以复兴,出现了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等大量教派。各世俗割据政权及各佛教教派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彼此吸收消融,或者在世俗割据政权身上孳生出教派力量,或者在佛教教派身上发展出世俗权力,这样,一个个割据状态下的政教合一制政权在后弘期时纷纷出现。这些教派既在宗教上各树一帜,又是社会上割据一方的僧俗封建领主集团以及互不统属、各据一方的小政权。其所实行的制度虽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显得简单、粗糙,未臻完备,所以可以把它称之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萌芽阶段。

直到凉州会盟后,西藏结束了后弘期政权纷立的割据局面,在原来萨迦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统一全藏的政教合一制政权,西藏的政教合一制才开始真正定型。萨迦政教合一制一跃而成为全藏范围的政教合一地方政权,从而使得政教合一制从分裂割据时期的雏形阶段发展到在西藏的完全确立。随后14世纪中期帕玛珠巴地方政权的建立到17世纪中期为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时期,17世纪中后期格鲁派政教合一制度的建立也标志着这一制度发展到了顶峰即政教领袖由达赖喇嘛一人同时担任。

2.为藏传佛教首度在藏区之外乃至全国大规模发展奠定基础。诚如前面所提到,随着九世纪吐蕃王朝统一政权的崩溃,在西藏出现了许多王族后裔和地方势力的割据政权,同时,随着反佛势力的消沉,藏传佛教经上下两路的弘传得以复兴,但也主要是在三地藏区发展,当然藏传佛教也在有限的范围内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影响。如根据《萨迦世系史》记录,西夏王邀请藏僧到王廷担任国师。但凉州会盟直接为藏传佛教在蒙古王室甚至整个蒙古族的传播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3.萨班·贡噶坚赞和阔端对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伟大贡献正是萨班最早建立起西藏地方与蒙古王室之间的直接政治联系。经过萨班的努力,蒙古汗国对于西藏基本上没有进行军事征伐。由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西藏地方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保证,藏族的封建经济也由此而得到持续的发展,这些都是符合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萨班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竭力说服持各种不正确见解的人,将自己的晚年献给了祖国的统一事业。

同样,为了祖国和平统一,阔端忍辱负重,放弃汗位,以汗国名义颁发诏书,亲派助手多达那波将军和女儿萨日朗一起前去邀请西藏高僧萨班来凉州会谈,才促成了凉州会盟这一具有里程碑式历史事件的实现。

凉州会盟已经离今天八百多年了,萨班和阔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对于西藏从此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推动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其历史功绩必将名垂千古。

## 参考文献:

- [1]樊保良,水天长.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第1版[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62.
- [2]蒙藏关系史略:第1版第1次印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北京市大兴县凤河印刷厂印刷,198:15.
- [3]贡嘎索南扎巴坚赞《萨迦世系史》,作者:阿旺贡嘎索南,译注: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中国藏学出版社:416.

作者简介:罗旦(1974-),男(藏族),西藏拉萨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博士二年级,研究方向:西藏中古史(指导教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导]陈庆英)。